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5.005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

王 斌

(长沙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19)

摘 要: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以文化统一战线为基础, 领导了抗战救亡文化、统一战线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党文化, 建构了抗战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文化的大旗, 始终高扬抗战救国的鲜明旗帜,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夯实了中共“文化合法性”基础, 为当下意识形态工作赋予了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化领导权;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文化抗战; 抗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5-0028-07

引用格式: 王 斌.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5): 28-34.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Cultur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Bin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Medic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1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sist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cultural united front, it led the anti-war and national salvation culture, the united front culture and the new-democratic party culture, and construct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anti-war cultu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ways holds high the banner of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holds high the clear banner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saving the nation, maintains flesh-and-blood ties with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endows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work with historical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al resistanc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17C0188); 长沙医学院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16]3号)

作者简介: 王 斌(1974—), 男, 湖南洞口人, 长沙医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文化领导权亦称“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文化抗战的大旗，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培育文化自信，建构“文化领导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与拥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1-5]抗战时期是我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时期，加强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研究，借鉴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与建构

对于抗战“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认识到建构的过程。抗战爆发后，为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提出并建构了抗战“文化领导权”。

（一）“文化领导权”的认识

1. 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重视。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6]822}对于领导权，毛泽东在分析土地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6]168}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6]241}同时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6]241}

2. 文化领导权概念的提出。在“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认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7]250}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文学创作获得发展的前提。他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展开文艺之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的观点，指出了无产阶级行使“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7]294}毛泽东结合抗战实际需要，系统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他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的领导权问题：“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6]659}1942年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和性质，再次提出包括抗战文化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6]812}。

（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从政治上掌握领导权，更需要从文化上建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是在苏联的帮助下，通过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和反击各种落后文化而实现的。其中，自身文化建设的成功是基础，对各种落后和反动文化反击的胜利是关键，苏联的帮助是必要条件。

1. 自身文化建设的成功是基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的旗帜，加强了自身文化建设，为建构抗战文化领导权奠定了基础。第一，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基础，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建构抗战文化领导权奠定了哲学基础。《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系列文章的发表，树立了“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高度自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取得全民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指南。第二，在“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形式多样、范围广阔的文化抗战活动，文艺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救国歌曲，巡演了许多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本。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深沉而炙热的爱。电影工作者利用电影独特的视角，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光辉形象。第三，大众化的文化抗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优势和战斗力量，建构起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话语权。

2. 对国民党落后文化反击的胜利是关键。中国共产党高举文化抗战的大旗，声讨投降文化，鞭鞑专制文化，反击反共文化，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局面。第一，对投降文化的反击。汪精卫公然背叛祖国和人民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先后发表《汪精

卫叛国》《讨汪与肃奸》等重要社论,揭露了汪精卫的丑恶行径及其反动本质,批判了汪精卫之流的种种亡国论调。毛泽东发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评论,提出要“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6]673}。这些斗争对于树立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必胜的信心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第二,对国民党反动文化的反击。针对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法西斯文化政策,中国共产党以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契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开历史倒车的恶劣行径,并提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文化运动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8]在中共南方局的主持下,《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贯彻进行得如火如荼,凝聚了共识,从而使《讲话》成为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强大理论武器。第三,是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以弘扬三民主义文化为借口,借机打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这场斗争。朱德、王稼祥、林伯渠、周恩来分别撰文批驳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范文澜、艾思奇、吕振羽则撰文从政治上揭露其反动本质,从思想上批判其世界观。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事实,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失去了人心。

3. 苏联的帮助是必要条件。毛泽东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1362-1363}这种援助,也包含苏联在中共“文化领导权”建设上的援助。这种援助,一是对毛泽东的支持。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9]296}这为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提供了支持。二是对中共的支持。1938年4月起,苏联《真理报》

相继发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山西的保卫者》《英勇的人民》等专文,再现中共抗战实景,介绍中共政策,提升中共形象,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战工作。1940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与口头宣传的决议》,要求中共中央派专家组到莫斯科开展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工作;^{[10]52}同时提出要在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宣传部以扩大影响的建议。

二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容和特征

抗战文化是以民族解放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文化领导权”集中体现为对抗战救亡文化的领导、统一战线文化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政党文化的领导,并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 “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1. 抗战救亡文化的领导。首先是救亡口号的引领。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就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口号。相持阶段到来后,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揭露和打击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则直接促进了抗战文化的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提出,则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其次是救亡媒体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强了对救亡媒体的领导。通过整风,使具有“党的喉舌”的《解放日报》最终形成了“完全党报”范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基础,进而对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1]通过对《新华日报》的领导,使其以响亮的号角、坚强的阵地,在国统区树立起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逐渐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使其在国统区“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12]。就连国民党人士都不得不承认在国统区“控

制舆论的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大公报》，而偏偏是《新华日报》”^{[13]278}。第三是救亡文化团体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胸怀、务实的工作加强了对救亡文化团体的领导。1937年，中共中央强调：“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任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14]275}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了这一指示，加强了对文化团体的领导，坚决执行了毛泽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13]88}的指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逐渐掌握了救亡团体的实际领导权。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具体领导人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坚决执行了周恩来的“用国民党的钱，干共产党的事”^{[15]56}的指示，把国民党的三厅变成了共产党的三厅。

2. 统一战线文化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6]659}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文艺界在抗日这个共同目标下组成了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了文化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我党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6]139}。张闻天提出了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同时提出只有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1940年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1944年发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明确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地位。其次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领导。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标志着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成立。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进步的根本宗旨，建立并维护着抗战文化统一战线，并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第三厅还是文工会，虽然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性质机构，可实际却是左翼的营盘”，领导权“在郭沫若、阳翰笙等左翼文化人那里”。^{[15]106}

3. 新民主主义政党文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

构建起以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政党文化，提高了自身的合法性、动员能力和政治认同。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抗战文化的先锋和领导者。首先，以“改造”为手段夯实政党文化的基础。一是对三民主义的“改造”，中国共产党正确区分了真假三民主义，创造性地将三民主义划分为“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16]，在理论上驳倒了国民党的“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二是对学习的“改造”，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得到克服，同时清算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党文化。三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加强了知识分子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性，不仅使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而且确立了文化领导地位，获得了文化领导权。^{[3]190}其次，以“整顿”为方式充实政党文化的内容。一是通过整顿党风，在组织上明确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树立了新型的政党文化。二是通过“整顿文风”，在作风上反对形式主义，以文风正党风、政风，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政党文化。三是从整顿机构着手，实施精兵简政，在制度上规范政党体制。第三，以“中国化”为路径夯实政党文化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路径，构建起完整的政党文化体系，实现了对政党文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以最低纲领和两步走战略实现了与三民主义的有机融合，并进一步指出马列主义将是三民主义的发展，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的宣传与“三三制”“精兵简政”的具体实践，有效削弱了与各政治团体相互间的政治摩擦，打消了各民主党派的顾虑，增强了彼此在政党文化上的融合与一致性，从而引领了政党文化。

（二）“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特征

1. 始终高扬抗战救国的鲜明旗帜，蕴含强烈的批判精神。抗战救国是抗日战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不管是从文化内容来看，还是从文化表现形式来看，抗战救国始终是其鲜明的主题。从文化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

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6]717}的三大政治口号,在“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6]836}“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912}的精神指示下,文化工作的一切都是围绕抗战救国来开展。《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报刊杂志辟出抗战专栏,《打回东北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激荡人心,《抗金兵》《屈原》等戏剧演出围绕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主题展开。同时,郭沫若等对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的文化阴谋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对梁实秋等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观点、沈从文等的唯艺术论倾向进行了批判,对战国派强权民族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以汪精卫等为代表的投降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文也进行了深入批判。

2.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81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首先,制订了“以提高和普及人民群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政策。其次,提出了“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文艺发展的根本宗旨,^{[6]812}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就是人口占90%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三,执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6]817}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广大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通俗的语言、手法创作了一批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

3. 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引领知识界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领导艺术界发出“抗战!抗战!将敌人的脚跟,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的誓言,激励中华民族“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先进文化方向,给人以奔向光明的信心。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

的。”^{[6]485}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文化建设本体性价值,文化建设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醒”^{[14]616},更在于“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17],奠定“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了”^{[6]845}的必胜信心。在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抗战方向的自信:“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6]169-170}

三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抗战文化的领导,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鼓舞了全民的士气,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夯实了中共“文化合法性”的基础,并赋予其全新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 历史价值

1. 擎起了抗战文化的大旗,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自己在抗战中所处的形势,以文化为旗,将全国的抗战力量汇聚在自己的旗下。第一,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华北事变后,及时地将最初的“抗日反蒋”调整为“逼蒋抗日”,后又调整为“联蒋抗日”,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通过正确的文化政策和丰富的文艺创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共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巩固了文化统一战线。“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不但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融洽了军民关系,更增强了人民对中共的认可度。

2. 引领了抗战文化的方向,为夺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树立了信心。第一,从战略的高度为抗战指明了方向,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这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肩负起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6]242}同时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6]256}的具体任务。第二,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的科学论断,

指出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具体阶段，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再次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第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点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已经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6]669}了。

3. 夯实了中共“文化合法性”的基础，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文化合法性是人们对政权的价值认同，是政权合法性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通过知识分子的改造，对抗战文化方向的主导，成功将延安塑造成坚决抗日的、民主的象征，成为代表民族文化和实现民族解放希望的“圣地”。中国共产党在注重民主建设的同时加强政党建设，通过政党建设促进文化建设，实现价值认同。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坦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威权”，“我想，国民党如不想新办法，死亡不远了。”谢伟思也在报告中指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18]黄炎培到访延安时，毛泽东更是以其“民主”新政的设想成功解答了黄炎培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疑惑，进一步夯实了“文化合法性”的执政之基，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文化统一战线为基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掌握了抗战文化的话语权，直接或间接地实现了对抗战文化媒体的管理，从而建构了抗战文化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成功“逆袭”，为当前我党“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领导权。一个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意无意的放弃，就意味着另一个阶级对它的占有。^[19]毛泽东说：“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6]614}；习近平提出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20]。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抗战中，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旗

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才保证了抗战文化的正确方向。也正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才促进了抗战文化的繁荣，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21]，“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20]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2]。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而树立文化自信。

2. 坚持大众化的方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掌握话语权。理论不能是枯燥的宣教，必须坚持大众化的方向，必须通过合理的“转译”，掌握话语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话语权的掌控，逐渐掌握了局势，赢得了民心。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到“民族形式运动”，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最后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的提出，大众化运动得到全面的贯彻实践。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推进，我们才在抗战文化中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当今，如何在世界舆论中夺得话语权，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不变的法则依然是坚持走大众化道路和群众路线。大众化是时代的潮流，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较之长篇大论的宣传更有效果；一句“撸起袖子加油干”，比起官样文章更加贴近实际。只有以大众化为方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才能掌握文化话语权。

3. 坚持对意识形态的有效管控，掌握管理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3]抗战时期，正是在“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24]的精神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文化媒体的管理，从而掌握了文化主动权。《解放日报》在毛泽东“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3]207}的指示下，真正起到了“党报是党的喉舌”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期盼“一张完全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愿望。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和舆论的喉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又一个方面军，即‘新华军’”^{[13]213}。在互联网

时代,意识形态之争更趋激烈和隐蔽,“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时不网”成为新常态,我们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强对党校、党报、党刊的管理,“坚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21]的准则,确保党报党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宣传领域,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5]在网络空间,要守住红色地带,亮剑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真正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有效管控。

参考文献:

- [1] 张士海.论延安整风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6):42-46
- [2] 杨恩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4.
- [3] 金颜.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机知识分子”培养:兼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J].广西社会科学,2016,254(8).
- [4] 杜芳.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话语方式[J].广西社会科学,2017(7):119-122.
- [5] 杜芳.抗战时期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动因[J].党史文苑,2016(22):10-13.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合订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8] 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92.
- [9] 徐则浩.王稼祥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296.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52.
- [11] 陈响园,李丹超.从文化领导权理论视角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兼论“完全党报”范式对当前新闻业的启示[J].江淮论坛,2014,53(2):137.
- [12]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N].新华日报,1946-01-11(1).
- [13] 唐正芒.“笔”血丹心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史稿[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1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5] 文天行.抗战文化运动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8.
- [1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2册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3.
- [18] 卢毅.抗战期间海外人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N].经济日报,2015-08-28(3).
- [19] 刘娜.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能力建设[J].沧桑,2010(8):19.
- [20]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5-10-14(1).
- [21]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9-02-26].<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01/c64094-28317481.html>.
- [2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9-02-26].<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 [2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 [24] 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9.
- [25] 倪光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责任编辑:黄声波